

## 國民黨太子元老黨爭 與1924年蔣中正辭職事件研究

彭毅聰

### 摘要

1923年孫中山為籌集討伐陳炯明款項，啟用孫科推薦的楊西巖等商人擔任廣東省政府要職，遭胡漢民等老黨員反對，形成以孫科為首的太子派與以胡漢民為首的元老派對立，雙方為爭奪利益而頻繁衝突。蔣中正始終傾向元老派，並參與協助後者恢復在粵權力的活動。1924年2月蔣以楊西巖不提供黃埔軍校籌備經費為由，辭去軍校籌備委員長職務並返回奉化。蔣氏與勸他復職的多名國民黨高層人物頻繁通信，提出其復職的條件為罷黜楊西巖，警告孫科，起用元老派的胡漢民、許崇智分別執掌廣東民政、軍事大權。孫中山一定程度同意這些要求後，蔣才返粵就職。從此元老派在廣東之力量日漸鞏固，蔣中正亦獲得可靠的發展環境，為打造其個人軍事力量奠定基礎。

關鍵詞：派系鬥爭、蔣中正、國民黨、孫科、胡漢民



# Chiang Kai-shek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Princlings Clique and the Elders Clique in the Guomindang, 1923-1924

Yi-cong Peng\*

## Abstract

In 1923, in order to raise funds for his war against Chen Jiongming, Sun Yat-sen appointed a group of businessmen led by Yang Xiyan, who were recommended by Sun Fo, to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move was opposed by Hu Hanmin and other old guards in the Guomindang (KMT). This dispute led to the forming a clique of party elders led by Hu Hanmin and a clique of princelings led by Sun Fo. The two factions struggled frequently for influence and interest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Chiang Kai-shek was inclined to support the party elders. In February 1924, Chiang resigned as Chairma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Fenghua on the grounds that Yang Xiyan would not provide funds for the academy. Subsequently, Chiang corresponded frequently with some senior KMT members who advised him to resume his post. He proposed to Liao Zhongkai and Sun Yat-sen the conditions for his return, namely to dismiss Yang Xiyan, admonish Sun Fo, and appoint Hu Hanmin and Xu Chungzhi as civil and military leaders, respectively, in Guangdong. Only after Sun Yat-sen agreed to these demands to a certain extent did Chiang return to Guangdong and resume his post. From then on, the power of the party elders in Guangdong was consolidated, and Chiang was given a secure environment for his own political futur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up personal military power.

---

\*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Keywords: factional struggle, Chiang Kai-shek, Guomindang (KMT), Sun Fo; Hu Hanmin**

# 國民黨太子元老黨爭 與1924年蔣中正辭職事件研究\*

彭毅聰\*\*

## 壹、前言

蔣中正的軍政生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其青年時期曾有過走馬燈般的14次辭職、復職經歷，頗引人關注。有學者研究孫中山與蔣中正的關係，其中略涉蔣歷次辭職的原因。<sup>1</sup> 有學者研究過蔣的青年革命經歷，對其辭職理由進行分類，發現蔣在不斷辭職中逐漸成長的線索。<sup>2</sup> 蔣於1924年辭去黃埔軍校籌委會委員長之原因，有不少學者撰文論述並有不同解釋。更多學者把這件事放在國民黨「聯俄容共」之背景下分析：有人認為事緣蔣對改組國民黨及聯俄容共有意見，抱怨孫中山對他不信任、不重用，對廣東省長的人事安排不滿。<sup>3</sup> 還有學者主張蔣不滿

---

\* 感謝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3年8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12月28日。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sup>1</sup> 王東方，〈試論蔣介石與孫中山〉，《史學集刊》，1986年第3期（1986年10月）；周興樑，〈略論孫中山與蔣介石的關係〉，收入周興樑，《孫中山的偉大思想與革命實踐》，（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44-465。

<sup>2</sup> 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頁1-50。

<sup>3</sup> 陳國強，〈蔣介石辭黃埔軍校職原因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1993年12月），頁237-248；曾成貴，〈蔣介石辭辦黃埔軍校問題考述〉，《理論月刊》，1994年第11期（1994年11月），頁26-28。

廖仲愷任軍校黨代表，企圖借辭職排擠廖氏。<sup>4</sup> 有論者則指出蔣期望孫中山能對革命陣營內部做根本改革，勿過於倚重外力援助。<sup>5</sup> 蔣辭職後曾致廖仲愷長函，裡面含有對蘇俄與共黨的疑慮，成為他右傾反共的「證據」。但也有學者主張要考慮蔣寫此信時的特殊背景，不能據此認為蔣反對聯俄容共。<sup>6</sup> 本文根據當時國民黨內部太子、元老派黨爭的大背景，結合近年面世的史料，希望對蔣中正1924年短暫辭職的原因進行新的解釋。<sup>7</sup>

## 貳、國民黨太子派與元老派之起源

國民黨所謂太子、元老兩派之形成，緣於討伐陳炯明的軍餉籌款問題。1923年1月孫中山倚靠楊希閔、劉震寰、沈鴻英之聯軍驅逐陳炯明。早在開戰之前約兩個月，眾多國民黨人已預先潛伏香港開展策動與籌款工作，當時鄒魯被任命為孫中山駐港特派員，鄧澤如為理財員。<sup>8</sup> 又據鄒魯記載：

我即邀鄧澤如、李文範、胡青瑞、胡毅生、林直勉、林樹巍先生等籌畫；而范其務、蕭冠英、廖志人等則襄助內部事宜；謝小呂則做宣傳。李烈鈞、古應芬、吳鐵城、謝良牧、譚啟秀、廖湘雲、魏邦平諸先生，也分頭進行。孫科、盧師諦、鄧泰中先生等復來港，多方協助。<sup>9</sup>

有大量史料揭示，在這個龐大的工作團內，國民黨人之間互相攻擊，各自拆

<sup>4</sup>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上冊（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頁92。

<sup>5</sup> 陳志剛，〈新視角下蔣介石與聯俄政策的考察〉，收入張憲文主編，《民國研究》，第2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38-50。

<sup>6</sup> 余敏玲，〈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頁49-87；楊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2002年12月）頁55。

<sup>7</sup> 對於太子派領袖孫科的研究，目前有兩本專著，分別為高華，《多變的孫科》（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與賴澤涵、黃萍瑛，《立法院院長孫科傳記》（臺中：立法院議政博物館，2013年），但對太子派與元老派之爭著墨很少，後書僅稱此為共產黨造謠。

<sup>8</sup> 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南京：正中書局，1948年），頁272。

<sup>9</sup> 鄒魯，《回顧錄》（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頁109。

臺，產生嚴重矛盾。據程天固回憶，上述相互衝突的在港國民黨人實質已分作兩部分：「其一為四邑輪船公司，為楊某伍某及一班廣東駐港的商人主持；其二設於羅便臣道，為鄧澤如、鄒魯、古應芬等一班老同志主持。」<sup>10</sup> 程天固口中的楊某、伍某即四邑籍香港富商楊西巖、伍學焜，他們通過孫科牽線，向孫中山承諾提供不少於50萬元的款項，要求的回報是100萬元，並由楊、伍等派人掌控廣東財政機關。<sup>11</sup> 與之相對者，鄧澤如、鄒魯等人之籌款相當困難，以致孫中山一度覺得該「香港機關，乃不名一錢」。<sup>12</sup>

四邑籍香港商人對國民黨的支持並非突如其來。以楊西巖為代表的四邑商人，係因美國排華法案而從美移居香港的僑商。他們儘管財力雄厚，但在香港上流階層則缺乏話語權，故在清末民初之交，開始積極投身中國政治以提升自身影響力。<sup>13</sup> 民國初建之際，由同盟會人組織的廣東軍政府即受這個商人集團的支持。如李煜堂被任命為廣東省財政司長，楊西巖則在香港負責領導一個四邑人籌餉團，從香港及海外為廣東政府籌得鉅款。<sup>14</sup> 孫中山第二次在粵護法期間，四邑商人大力支持孫就任總統成立正式政府，且為護法議員提供3萬港元作旅費。作為回報，他們獲得廣州市內一塊高價值地皮。<sup>15</sup> 如此看來，楊西巖等人資助國民黨討陳攻粵是該集團一貫作法之延續。

作為民國建立後首任廣東都督，胡漢民對這個商人集體絕不陌生。後者除帶來金援之外，並未給革命黨人帶來更多好印象。<sup>16</sup> 大概因為如此，胡漢民十分反

<sup>10</sup> 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上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3年），頁142。另外鄒魯與古應芬亦無法合作，見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615-4616、4618-4619。

<sup>11</sup> 〈廣東政局變化的面面觀（一）〉，《叻報》，新加坡，1923年5月30日，版6；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上冊，頁142-143。

<sup>12</sup> 〈覆林森〉，《中央黨務月刊》，第9期（1929年4月），「特載」頁26。

<sup>13</sup>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 37-38.

<sup>14</sup>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p. 41.

<sup>15</sup>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p. 85.

<sup>16</sup> 李煜堂任廣東財政司長時，疑似侵吞巨額公款，四邑商人向政府出借款項的利息甚至高達

對再次從楊西巖等人手上借款。楊氏等透過孫科<sup>17</sup>向孫中山提出「廣東省長一職須俾予徐紹楨（辛亥時紹楨為江蘇第九鎮統制，參與光復南京之役），以抵制展堂，並須發表西巖為財政廳長，學滉〔焜〕為鹽運使（兩職皆肥缺），以酬庸彼等之效勞。上述條件係由哲生負責談判，而經中山先生認可者」。胡漢民因此對孫科「大不謂然，於是雙方發生爭執」。<sup>18</sup>由於駐港國民黨人紛紛去電上海對孫中山之任命提出異議，孫氏一度改變初衷。<sup>19</sup>江防事變後孫科、張啟榮、伍學焜、陳少白<sup>20</sup>集體趕赴上海，一方面勸服中山下定回粵決心，另一方面再次為徐紹楨爭取到省長之任命。<sup>21</sup>中山赴廣州重組大本營，路過香港期間還在楊西巖家小住。胡漢民為四邑商人得勢一事大表不滿，在港與孫中山爭吵後負氣返滬。這次關於廣東省長任命之衝突，揭開國民黨太子元老兩派衝突之序幕。

太子、元老派究竟有哪些人物？從親歷1923-1924年間兩派黨爭的程天固之回憶可知，以胡漢民為首，反對孫中山向四邑商人借款的老同志即「元老派」，孫科被稱為四邑商人之領袖，形成「太子派」。<sup>22</sup>另有人回憶，太子派「多為國民黨的新興豪門貴胄之公子爺，和公子爺們的同學，故先有孫中山之子孫科、伍廷芳之子伍朝樞，與留美之傅秉常昆季以及為數眾多的留美學生，繼之者有伍漢

---

50%，見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pp. 45, 47.

<sup>17</sup> 孫科實際上透過台山人馬超俊、劉維熾（季生）與四邑商人聯絡。見馬超俊，《馬超俊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頁39。

<sup>18</sup> 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31-33。孫中山重用資本派是企圖以之與香港富商建立良好關係，從而獲得資金援助。1923年初的孫中山似沒意識到與陳炯明的戰爭會變成長期拉鋸，從而摧毀他與粵港商人的關係。見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66。

<sup>19</sup> 〈廣東政局變化的面面觀（一）〉，《叻報》，新加坡，1923年5月30日，版6。

<sup>20</sup> 陳少白也是四邑人，與李煜堂相熟，在四邑輪船公司任經理。見陳察吾，〈陳少白先生事蹟拾遺〉，收入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59。

<sup>21</sup> 羅良斌，〈參加驅逐陳炯明戰事的片段〉，收入《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卷，頁410。

<sup>22</sup> 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上冊，頁143。



持之子伍伯勝、唐紹儀之子唐榴等輩」。<sup>23</sup> 至於元老派，據傅秉常1925年逃往香港後透露，其成員有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和蔣中正。<sup>24</sup> 曾負責保衛孫中山的張猛則提供了兩派在軍人勢力中的名單，元老派有「周之貞、朱卓文、李安邦等人，都抓有民軍的勢力」，太子派「如陳策、張惠長、陳慶雲等抓了海空軍實力」。<sup>25</sup> 其實兩派黨爭過程比較複雜，後人的敘述多將實際情況簡單化，兩派具體成員需仔細分析。

筆者認為，太子派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個範疇。狹義者僅指與孫科個人關係相當密切，以地緣、親緣、私交為紐帶結成的小核心團體。在該團體周邊分別有資本派、舊交通系、外交系、海空系四個團體，從而構成廣義的太子派。<sup>26</sup> 因本文研究範圍所限，在此僅重點分析狹義之太子派及所謂資本派。

太子派中的核心小團體（即狹義太子派）由與孫科有親密關係的人物組成。孫科以其為孫中山獨子之故，在國民黨內有特殊地位，也因此有「太子」名號。該稱謂確實給人政壇「豪門貴冑之公子爺」的印象，他們與為利而來的香港大商人可以合作，但要融為一爐似不太可能。<sup>27</sup> 以孫科為首之「太子派」出現於報紙的時間，不晚於1923年4月。<sup>28</sup> 如反國民黨的《時事新報》即指出太子派首領為孫科，其成員還有戴恩賽（孫中山女婿）、陳策。<sup>29</sup> 據說在徐、楊、伍三人第一次下臺後，孫

<sup>23</sup> 黎思複，〈「南堤小憩」揭秘〉，收入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193。

<sup>24</sup> 金應熙，〈省港大罷工史料選譯〉，收入金應熙，《金應熙史學論文集（近現代史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63。

<sup>25</sup> 張猛，〈我追隨孫中山的經歷和見聞〉，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195。

<sup>26</sup> 舊交通系主要有葉恭綽、鄭洪年、陳其瑗，外交系有伍朝樞、傅秉常等，海空系有陳策、張惠長等軍人。

<sup>27</sup> 黃震威，《傅秉常傳：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8年），黃一書總結了太子派名單，資本派及舊交通系人均不在其中。

<sup>28</sup> 也有少量新聞稱之為「世子派」，請參見平，〈粵戰局與政潮之情況〉，《申報》，上海，1923年10月16日，版10；〈粵局轉危為安〉，《申報》，上海，1923年11月9日，版10。

<sup>29</sup> 〈粵局變化與變賣公產〉，《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4月11日，張1版2。該新聞也指出太子派與「資本團」不同。

科才打出「太子派」之名號「與元老派戰」。<sup>30</sup> 關於太子、元老兩派鬥爭的報導中，前者似乎僅有孫科一人，到1924年才把吳鐵城歸入太子派中，並指出吳為孫科之左右手，孫科實力之所在，甚至為「孫科之靈魂」、「幹殿下」。<sup>31</sup> 如果僅有孫吳二人，自難成「派」，能歸入太子派之人物還有孫科的私人秘書陳劍如（曾任市政廳總務科科長等職），與孫關係密切的馬超俊，及前文提到的戴恩賽等。大致看來，這是一個靠地緣、親緣、私交關係結成的團體。<sup>32</sup> 但這些人物在國民黨內均無多少號召力（尤其是與元老派人物相比），除吳氏外多未就政府要職。傅秉常在其回憶中承認「太子一派，人材缺乏，殊不足與展堂左右相頡頏」，<sup>33</sup> 這也成為孫科倚重四邑商人與舊交通系的原因（否則將無人可用）。

所謂資本派，即1923年間爭奪廣州政權之四邑商人集團。他們受孫科青睞，除源于陳少白、馬超俊的引薦外，其一度旅居美國之經歷可能也起到作用。<sup>34</sup> 是年3月初，有報紙將該集團稱為「財政系」，到4月間則有「資本派」之名，並將徐、楊、伍三人執掌廣東大權視為資本派擁戴之結果，徐紹楨代替胡漢民做省長是「資本派與元老派戰」。<sup>35</sup> 亦有新聞指出，徐紹楨上臺是孫科「太子派」與資本派聯合之結果。<sup>36</sup> 1923-1924年間，報紙媒體對資本派、太子派關係之表述有兩種，其一是嚴格區別太子派與資本派；<sup>37</sup> 其二是將兩者混為一談，資本派即太子派，或稱孫科、吳鐵城是資本派，資本派以孫科為首領，<sup>38</sup> 或認為徐紹楨、楊

<sup>30</sup> 〈太子派內部又分裂〉，《總匯新報》，新加坡，1924年2月15日，版5；〈粵京宮廷爭寵記（七）〉，《叻報》，新加坡，1924年5月31日，版10。

<sup>31</sup> 〈波譎雲詭之粵省政局〉，《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5月30日，張2版1；〈廣州政局大變化之經過〉，《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9月23日，張2版2；〈廣州政局大變化之醞釀〉，《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12月19日，張1頁3。

<sup>32</sup> 吳氏原籍香山，陳、馬均台山人。

<sup>33</sup> 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頁39。

<sup>34</sup> 孫科曾留學美國，其市政廳僚屬曾經也是以西方留學生為主。

<sup>35</sup> 〈孫中山回粵後軍政界現狀〉，《申報》，上海，1923年3月2日，版10；〈粵軍政界近況〉，《申報》，上海，1923年4月11日，版7；〈粵政局變化之經過〉，《申報》，上海，1923年5月15日，版10。

<sup>36</sup> 〈醞釀中之粵省政局〉，《華字日報》，香港，1923年4月9日，頁3張1。

<sup>37</sup> 有人便將當前廣州國民黨高層派系劃分為「太子派（即孫科派）、資本派、元老派」。請參見〈批評中國國民黨（下）〉，《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11月8日，張1版1。

<sup>38</sup> 〈粵孫滇唐聯合之經過〉，《順天時報》，北京，1924年9月27日，版3；〈大敵在前之政

西巖、孫科皆太子派。<sup>39</sup> 該派人物被孫科引薦而躋身粵省高層政治，且在面對政敵攻擊時又獲孫科支持，故雙方關係一度相當密切，被混為一談並不奇怪。

徐紹楨長粵時，太子派在廣州南堤設一俱樂部，叫「南堤小憩」。眾人常在內吃喝玩樂，並將之變成「獲悉官場動態，施政趨向，趨炎附勢，角逐功名」的場所，故該處被視作太子派的標誌。<sup>40</sup> 1927年後孫科繼續積極參與黨內政治，再次形成擁護自己的政治派別，但彼時之太子派與此時已大不相同。<sup>41</sup>

元老派是因反對太子派而存在的派別，主要成員為國民黨內長期追隨孫中山左右的一部分粵籍革命黨人，其資歷普遍深於太子派成員。1923-1924年間的新聞報導，常把一連串粵籍老黨人的名字列在元老派名單中，如「元老派胡漢民汪精衛為首，鄒魯古應芬等屬之」；「輔孫者如胡漢民廖仲愷鄒魯輩，多年與共患難即世所稱元老派也」；「元老派胡漢民廖仲愷鄒魯汪精衛諸人」。<sup>42</sup> 無論名單中有何人，胡漢民都是該派領袖。胡氏在黨內有重要地位，不僅緣於其長年追隨孫中山並被倚為左右手，還與胡在民元擔任過廣東都督有關。「所謂民黨四都督者，胡氏其一也」，「其在黨之歷史，較之汪精衛廖仲愷兩氏，尤為深長」，<sup>43</sup> 胡漢民乃元老派首領可謂當之無愧。至於汪精衛氏，其在黨之歷史雖然頗長，但在兩派互鬥最烈之時期，汪多駐上海及往還於皖奉兩系間，在黨爭中不占重要地位，故不可能為該派首領。

---

爭》，《順天時報》，北京，1924年9月22日，版3；〈粵京宮廷爭寵記（七）〉，《叻報》，新加坡，1924年5月31日，版10。

<sup>39</sup> 〈孫文拍賣學校之大風潮〉，《晨報》，北京，1923年4月22日，版6。

<sup>40</sup> 黎思複，〈「南堤小憩」揭秘〉，收入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輯，頁193。又據譚延闓日記，譚氏、蔣中正、廖仲愷等非太子派人物也不時在南堤小憩就餐，該處實際上還是國民黨在粵高層人物日常吃飯之場所，惟太子派人物使用更頻繁。

<sup>41</sup> 即前文提到黃震威著作中研究的太子派。

<sup>42</sup> 炎炎，〈粵局變化與變賣公產〉，《時事新報》，上海，1923年4月11日，張1版2；穀廬，〈楊庶堪任粵省長〉，《申報》，上海，1924年2月10日，版10；〈粵政黨提倡共產中之政潮〉，《大公報》，天津，1924年3月3日，版3。

<sup>43</sup> 伯矢，〈胡漢民政治生涯之一頁〉，收入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頁152；何甫，〈三中全会前之國民黨各派系〉，收入《現代史料》，第2集，頁14。

基於該派人物與胡漢民的關係，元老派可分為核心與周邊兩類。前者以胡漢民為核心，其嫡系人物胡毅生、胡清瑞、陳融、林直勉等輔之。其中二胡與陳融都是漢民之親戚，故相互私交極厚。<sup>44</sup> 林直勉乃胡氏幕府中人，1923年胡短暫任省長時由林作其秘書長，被視為胡派之中堅。<sup>45</sup> 該派人喜在胡毅生開設於廣大路之「文華堂」紙筆店聚會，故文華堂成為與南堤小憩壁壘分明的另一派別聚集地。<sup>46</sup> 其中胡毅生、胡清瑞二人影響力極大，傅秉常指出在元老派當政期間，「清瑞不願作高官，但以財廳一科長身分，常與包商勾結。雖廖仲愷任財政廳長時，亦對清瑞無可奈何。毅生個性頑強之至，亦常與包商勾結。」<sup>47</sup> 二人即便不在省政府工作，亦常至省署幹預政事，外間謂胡漢民私人遍布省署即指此也。<sup>48</sup> 另據葉恭綽回憶，當時一切財政及官營事業多由胡清瑞一派人包辦，他們擁鄒魯做財政廳長，清瑞做「顧問」，幾乎等於代鄒執行職務。<sup>49</sup> 胡漢民之個人操守極佳，卻對其兄弟極端包庇，太子元老黨爭一定程度上即因二胡與資本派爭奪政府要職背後的經濟利益而起。

元老派的周邊人物包括廖仲愷、汪精衛、鄧澤如、鄒魯、許崇智、蔣中正等。他們與胡漢民因多年的革命工作產生關係，但與胡的私交則有親有疏，故其內部之間，以及與元老派核心層之關係各不相同，亦不穩定。據說廖仲愷曾「有意拉攏哲生與展堂，望雙方能復歸於好」，反導致胡氏對仲愷「則誤會極深，認

<sup>44</sup> 清瑞為漢民親兄，毅生乃漢民堂弟。

<sup>45</sup> 〈粵政局黨派分歧〉，《晨報》，北京，1923年6月3日，版5；胡漢民負氣出走上海時，林直勉亦隨行者之一。請參見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7冊（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頁174。

<sup>46</sup> 該店由胡毅生經營，專營古董、字畫、文具等物，因胡毅生喜收買此類物品。

<sup>47</sup> 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頁43-44。

<sup>48</sup> 羅翼群，〈廖案感舊錄〉，收入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等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1卷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頁268；〈戰雲四起中之粵政局〉，《晨報》，北京，1923年7月6日，版5。

<sup>49</sup> 葉恭綽，〈我參加孫中山先生大本營之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9輯，頁155。1924年楊庶堪剛任省長及陳其瑗兼任省財政廳長之初，仍欲聘清瑞做顧問，可見其勢力強大。請參見〈省署一大幫顧問參議〉，《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3月8日，版3。該派人連省政府內人員安排亦意圖插手，曾當面質問徐紹楨為何不用國民黨人做官。請參見〈廣東政局變化的面面觀（二）〉，《叻報》，新加坡，1923年5月31日，版6。

為仲愷變節賣友」，廖、汪也一度對胡意見頗深。<sup>50</sup> 鄧澤如為人則較「圓通」，包括資本派在內的各方人物對之亦有好感。<sup>51</sup> 鄒魯被認為「生平見利勇為」，長期有染指廣東財政之野心，<sup>52</sup> 平時「非胡之嫡派，此次結合，不過互相利用」<sup>53</sup>。另外許崇智與胡漢民的私人關係亦不佳，他為謀取省長職務也曾不惜倒廖仲愷的臺，蔣中正則因反對倒廖而辭職返鄉。總之，他們是基於各種不同的考慮而加入反太子派陣營，從而成為元老派一員，內部實際頗不一致。

### 叁、1923年太子元老兩派衝突概況與蔣中正之態度

1923年2月徐紹楨、楊西巖、伍學焜三人正式履職，是所謂資本派之掌權時期。但該派上臺伊始即遇到極大的財政困難，導致掌權時間不長。孫中山返回廣州後，意圖編遣各路軍隊，據說曾為此下令徐、楊二人5日內準備現洋300萬。<sup>54</sup> 1923-1924年間，沈鴻英部桂軍、楊希閔部滇軍相繼占據廣州市內及周邊一帶要地。與當時其它軍隊類似，他們多在本軍防地大肆搜刮，並擅自截留本歸政府財政機關抽收之稅捐等收入。至於廣州市外的廣東各地收入，也大多分別被派別不同的各地駐軍占有。因此，「省庫收入短絀異常」，政府庫空如洗，「司財政者不免有仰屋之歎」。<sup>55</sup> 孫中山所轄之聯軍部隊一方面將地方財富據為己有，另一方面又不斷催促革命政府提供軍餉。3月底「楊西巖呈帥府謂各徵收機關全被軍隊佔據，毫無收入，軍費無定額，各處催支急如星火」。<sup>56</sup> 擔任兩廣鹽運使的伍學焜同樣一籌莫展。因大量鹽船仍被軍隊截留，鹽商自1922年9月以來都無法去

<sup>50</sup> 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頁51-52。

<sup>51</sup> 〈逐鹿中之省長〉，《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1月18日，張1頁3。

<sup>52</sup> 〈鄒海濱軼事訂正〉，收入《現代史料》，第3集，頁109。

<sup>53</sup> 〈元老太子派爭廣州政權志（二）〉，《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5月28日，張1頁3。  
該新聞指出鄒魯參與討袁失敗後亡命南洋期間，並無加入中華革命黨，且常在演說中有不滿於胡漢民之言論。

<sup>54</sup> 〈孫中山返粵後之種種消息（三）〉，《叻報》，新加坡，1923年3月10日，頁10。

<sup>55</sup> 〈粵軍政界近況〉，《申報》，上海，1923年4月11日，版7。

<sup>56</sup>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3年3月24日，版4。



鹽場配鹽，市面充斥私鹽等原因，鹽運署收入銳減。<sup>57</sup> 為應付各方催款，或遊說軍官讓出占據的收入來源，楊、伍二人常預先墊付部分餉項。<sup>58</sup> 為儘快籌款，當局決定拍賣官產、公產，由財政廳、市政廳（孫科掌控）具體執行，<sup>59</sup> 其中不少產業直接移交或低價出售給楊西巖等四邑商人，以償還其墊款。<sup>60</sup> 當時投變官產過於倉促、流弊甚多，除有人胡亂舉報公產引起糾紛，經手官員營私舞弊、上下其手外，四邑商人更是乘機大獲其利。該派商人常以低於評估售價的金額投得眾多公產；<sup>61</sup> 楊西巖身為財廳之長，曾一度無視上級催款，每日將該廳收入匯往廣東銀行（楊氏為股東之一）。<sup>62</sup> 社會自然因此怨聲不斷，孫科、楊西巖等均受到外界激烈批評。1923年4月中旬沈鴻英叛變，廣東多地重燃戰火。因孫科戰前曾主張籠絡沈氏，加上資本派難以應付軍餉，此番變故使元老派更有口實攻擊太子派。孫中山認為楊西巖等無能，於5月7日免去徐、楊、伍三人職務，任命廖仲愷為省長，改鄧澤如任兩廣鹽運使，以葉恭綽長財政部並兼省財政廳長。<sup>63</sup> 因胡清瑞等人反對葉氏長財廳，18日孫中山又改鄒魯任財政廳長。約過一個月，胡漢民被任命為大本營總參議，隨後代理大本營後方事務。時人據此認為粵政已改由元老派掌握。

然而元老派人物之執政同樣不穩，數月內亦相繼離職。首先，該派同樣面臨前線急需軍餉的難題，財政收入仍倚賴拍賣官產、公產。其次，太子派時刻伺機

<sup>57</sup> 〈廣東省河鹽路滯銷〉，《叻報》，新加坡，1923年4月18日，版16。

<sup>58</sup> 〈一年來雞鶩爭食之財政狀況〉，《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3月19日，張1頁3。

<sup>59</sup> 〈粵政局變化之經過〉，《申報》，上海，1923年5月15日，版10。

<sup>60</sup> 如仁威沙廟產、大佛寺和華林寺的部分產業，總計作價百多萬抵還給楊西巖、林護二人。見沈仲強、吳述彭，〈大元帥大本營時期的財政狀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頁580。

<sup>61</sup> 拍買公產的人基本僅限於四邑商人群體，見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p. 95.

<sup>62</sup> 〈粵局變化與變賣公產〉，《時事新報》1923年4月11日，張1版2。拍賣官產、公產引發的問題參見沈成飛，〈廣州官產投變事件中的革命政府與地方社會〉，《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2014年8月），頁90-97。

<sup>63</sup>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廣州，1923年5月11日，第10號，頁13-15。撤換楊西巖及任命葉恭綽原因又見〈中山任用葉恭綽之原因〉，《叻報》，新加坡，1923年5月24日，版10。

拆臺，試圖重奪政權。1923年6、7月間許崇智開始謀逐廖仲愷下臺，由自己代之任省長，其背後有資本派支援。<sup>64</sup> 另外，大本營為增加收入嘗試招商恢復廣州造幣廠生產。9-10月間，葉恭綽的財政部與鄒魯的財政廳卻因該廠招商承辦權之歸屬發生爭執，親近元老派的承辦商鄒殿邦被孫科下令拘捕。胡漢民為此至市政廳交涉，與孫科發生嚴重衝突。同時，許崇智怨財政廳籌撥軍餉太少，向孫中山指控各後方機關貪汙。孫下令調查兵站部、財政廳、鹽運署、官產處、公安局。<sup>65</sup> 經孫科遊說，查辦範圍縮小為兵站部、財政廳，令查辦僅波及元老派而不涉太子派，負責查辦者又是與鄒魯不和的古應芬。據說胡漢民受此兩事刺激，於10月初辭職離穗。<sup>66</sup> 隨後廖仲愷、鄒魯、鄧澤如皆提出辭職，<sup>67</sup> 為避免政潮波及討陳戰事，中山暫時不允三人離開。之後約3個月中，國民黨高層把精力放在改組本黨的工作，省長的繼任人選懸而未決。1923年11月中旬討陳聯軍潰敗，許崇智嫡系的東路討賊軍在博羅、增城一帶大敗，致其實力與威信均嚴重動搖，謀奪省長之計頓成畫餅。戰後許氏在會議上既遭孫中山訓斥，又受楊希閔等人指責，遂賭氣避居上海，其時間為11月末，與廖仲愷、鄒魯離開廣州的日期相近，<sup>68</sup> 元老派可謂一敗塗地。12月孫中山先任命伍學煒為廣東全省船民自治聯防督辦，<sup>69</sup> 後任楊西巖為禁煙督辦，顯然再次倚賴二人籌款，社會風傳資本派再謀省長席位，該派有捲土重來之勢。<sup>70</sup>

<sup>64</sup> 《譚延闓日記》，1923年6月26日條；〈粵省最近之政潮〉，《晨報》，北京，1923年8月19日，版5。

<sup>65</sup> 廣東省檔案館編，《民國廣州要聞錄：近代廣東海關檔案（粵海關情報卷）》（以下簡稱《民國廣州要聞錄》），第17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155。

<sup>66</sup> 〈廣東帥府元老派總辭職〉，《晨報》，北京，1923年10月21日，版5；〈粵省政潮之原因〉，《大公報》，天津，1923年10月19日，版3。

<sup>67</sup> 廣東省檔案館編，《民國廣州要聞錄》，第17冊，頁159；〈孫派內訌日烈〉，《晨報》，北京，1923年10月18日，版5。

<sup>68</sup> 王業晉主編，黃健敏、李寧整理，《李仙根日記·詩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53；許人，〈許崇智的一生〉，收入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8。

<sup>69</sup> 該職名為促進省內船民自治，但船民需繳納自治聯防經費，故其籌餉目的甚為明顯。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廣州，1923年11月23日，第38號，頁51-52。

<sup>70</sup> 資本派敢再捲入政壇，或因其先前執政時墊付之款項尚未賺回。

國民黨內發生太子派與元老派之爭時，蔣中正仍是黨內的後輩。在參加革命的過程中，他與胡漢民、廖仲愷等中山左右手來往逐漸密切，在此黨爭爆發時也完全站在元老派一方。早在1923年2月18日，孫中山令蔣中正擔任大元帥大本營參謀長，蔣卻沒立即就職。3月初，古應芬函蔣勸其往粵就職，蔣覆稱眼病，需待見過許崇智、胡漢民等，瞭解廣東情況後再去。<sup>71</sup> 3月14日，蔣在奉化老家接待一眾元老派人員：「展堂、精衛、海濱、毅生、直勉、煥廷諸同志，由滬來甬，暢敘時局」。除汪外，其他人多是不滿太子派受重用而從廣東來的。據蔣日記顯示，他們天天出外遊玩，直到19日回上海。在上海，蔣又常與胡、汪及剛從日本抵滬的廖仲愷談論時局。<sup>72</sup> 這差不多兩周時間裡，蔣對粵中太子、元老之爭當有深入瞭解，到3月21日，他第一次公開表露自己的立場。他致電孫中山，請注意整理粵省財政，提議由廖仲愷負責此事，實際是提議用廖仲愷更換財政廳長楊西巖。<sup>73</sup> 24日大本營秘書長楊庶堪電告蔣中正，稱孫已同意廖掌管財政廳，待蔣返穗後即發表。蔣中正仍不滿意，於4月8日回信道：

軍事當促許軍尅期抵省……政治當以整理財政為先。廳長不速易人，延誤大局，必非淺鮮。弟對此點，自信見解或較在粵諸公正確，故欲行之前，不得不將此等成敗關鍵，竭忠盡言，決非有何作用參於其間也。財政如無把握，軍事難定計劃，廖任廳長、許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起程前發表，俾弟到省後，即可著手進行，而鼓來者之氣也？<sup>74</sup>

廖仲愷在4月13日發了封內容非常嚴重的電報促蔣動身，謂如不來，則「遁世絕交、不問世事」，<sup>75</sup> 後者才於19日抵達廣州，開始大本營參謀長的工作。不過隨著戰爭的持續，蔣無法忍受討陳聯軍之內部矛盾而於7月辭職，<sup>76</sup> 隨後赴俄

<sup>71</sup>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頁187。

<sup>72</sup>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23年3月14-27日。

<sup>73</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22。當時廖仲愷早被任命為大本營財政部長（未就職），故任命廖整理財政應指任其作財政廳長。

<sup>74</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24。

<sup>75</sup> 王業晉主編，黃健敏、李寧整理，《李仙根日記·詩集》，頁15。

<sup>76</sup> 蔣本次辭職與滇軍內部總司令之爭及許崇智謀奪廣東省長有關。請參見〈與楊庶堪書縱談粵局與個人行止〉，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6（臺北：中國



考察，直到年末才回國，那時廣東太子與元老兩派地位已經逆轉。

1923年12月，蔣中正回國途經上海時，拒絕了胡漢民、汪精衛邀其留滬辦理黨務之建議，逕至老家奉化蟄居。這年最後半個多月裡，他再次就太子元老黨爭遺留的問題，即元老派之前途問題有所主張，主要從政治與軍事兩方面為元老派重奪粵省權力作布局。

政治方面，他主動過問廣東省長問題。據當月22、26日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聯名致蔣的兩信：

今晨弟等復聯電先生，乞速發表，並乞滄白勿辭。此事總可如兄之所言。惟望兄早日來滬。鮑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萬不能以此一事，遂耽擱來滬之期也。鮑先生事，尤關重要，彼每見弟等，必問兄來未。弟等以為此事或較省長問題為尤重，兄不可因小失大也。<sup>77</sup>

兄所主張者，今諸問題待兄至而決。兄遲遲不來，黨事無形停頓，所關甚大。……省長問題，猶在其次，滄白就否，尚有數度之磋商。兄若坐等省長發表，始來上海，此層似非必要也。<sup>78</sup>

文中之滄白即楊庶堪（字滄白），護法時期曾銜中山之命作四川省長，1923年曾任大本營秘書長等高級幕僚職位。他一度認蔣為自己的生死患難之交。<sup>79</sup>這兩封信顯示蔣已向國民黨高層力推楊庶堪繼任省長。觀察楊氏在大本營近一年的工作經歷，至少能確定他與胡、廖等人並無衝突，加上他與蔣中正關係不淺，可推測蔣之目的為：在粵省政治中樞為元老派，也為蔣自身留下一個可信任之人。<sup>80</sup>楊氏能被孫中山納入考慮範圍，一方面因他與駐粵滇軍略有淵源，<sup>81</sup>另一

---

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91-92。

<sup>77</sup> 尚明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87。

<sup>78</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44-145。

<sup>79</sup> 楊滄白，《天隱閣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頁378。

<sup>80</sup> 李吉奎教授認為楊任省長等同於胡漢民擔任。見李吉奎，〈中國國民黨一大前後孫蔣關係研究〉，收入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第1輯（上海：上海宋慶齡研究會，2009年），頁23。

<sup>81</sup> 楊希閔等為顧品珍舊部，曾征戰於四川，故與川人楊庶堪、盧師諦有聯繫，該部滇軍入粵與盧師諦之遊說有關。楊庶堪與盧氏在穗時來往頻繁。

方面也因孫氏不欲在各方對省長職位之爭奪中偏向任何一方。<sup>82</sup> 這段時間，蔣很可能通過書面向孫中山陳述對政局、人事的主張，故孫囑他「皆非至粵面談不可」，<sup>83</sup> 但蔣並不動身，似乎非待發表楊庶堪任省長不可。

軍事方面，粵軍領袖許崇智亦倚賴蔣中正為其謀劃。早在許崇智負氣出走後不久，孫中山即任命他為粵軍總司令，聯軍中所有粵系部隊「歸總司令編練整頓，節制調遣」。<sup>84</sup> 畢竟在當時的粵籍軍人中，惟許崇智有足夠資歷統攝粵籍聯軍，故孫仍對之抱有厚望。但許氏聚焦於保存並發展其嫡系東路討賊軍，為此須在後勤補給、發放經費、指定防地等方面有所安排（許部自粵東歸來後一直無固定地盤）。由於滇軍阻撓，中山愛莫能助，故許氏不願就職。<sup>85</sup> 許氏向古應芬解釋其滯留上海不歸之原因道：「因忤於以前在粵時，亦復無所裨益，故不能不俟介石兄到後，商酌具體辦法。候帥座核定施行時，再行返粵，藉供驅策。」<sup>86</sup> 可見許崇智希望在就任粵軍總司令之前，先由蔣中正為他回粵控制並發展粵籍聯軍進行劃策。蔣於次年1月3日抵滬，16日出發回穗。這半個月中他有足夠時間與許崇智對各種重要問題進行討論。蔣願意動身往粵應該與其建議被孫中山採納有關——後者於1月29日任命楊庶堪為廣東省長。<sup>87</sup>

## 肆、蔣中正之突然辭職及其主張

蔣中正此番回粵，主要為擔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然而他僅逗留三十多天便掛印而去並重返奉化。國民黨高層得知情況後，即派鄧演達往奉化相勸。據鄧報告：「介謂彼去實因保持與先生之感情，現非有改革決心，國黨皆陷絕望。若

<sup>82</sup> 〈論以楊庶堪為廣東省長〉，《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2月14日，張1頁2。

<sup>83</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44。

<sup>84</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26。

<sup>85</sup> 〈許崇智返粵後之聯軍暗潮〉，《總匯新報》，新加坡，1924年6月5日，版2。

<sup>86</sup> 李穗梅主編，《古應芬家藏未刊函電文稿輯釋》（廣州：廣州出版社，2010年），頁159。

<sup>87</sup> 蔣中正並非唯一推薦並支持楊庶堪之人，其建議在多大程度影響孫中山仍待考察。

能公開整理財政，革除市儈壟斷財權〔按：指楊西巖拒發軍校開辦費〕，並促展汝回，則彼可回。其意堅決，盼陳先生且警哲生醒悟。」<sup>88</sup> 可見根據蔣中正自身之解釋，他此番辭職完全是針對楊西巖與孫科而發。已有學者注意到，這反映蔣一直著眼於促進粵政內部事務之改革。<sup>89</sup> 在筆者看來，蔣所關注的改革，與太子、元老派之爭有密切關係，故試從該電報出發，結合往後一個月蔣與各方往來函電，對蔣本次辭職之事件再作解讀。

蔣中正要求「公開整理財政」，反映軍校籌備工作遭遇財政困難，其目標直指楊西巖。有檔案顯示：1924年1月23日，孫中山令撥1萬元做軍校開辦費，其中楊西巖的禁煙督辦署承擔1千5百圓。2月8日又令禁煙督辦署提前發給軍校開辦經費6萬圓。<sup>90</sup> 眾所周知，當時廣州革命政府之財政狀況非常困難。1924年1至2月間，政府仍忙於籌集經費進行東征與北伐。禁煙署靠推行鴉片專賣牟利（對外謊稱銷售戒煙藥），但由於滇軍包庇煙商及私設大量煙館，該署實際很難獲利。<sup>91</sup> 大本營財政委員會的紀錄中不時有「禁煙督辦署函覆無款撥交」，「實無法籌撥」，「以後無力再支」等語。<sup>92</sup> 楊西巖在廣東從政期間，為財政預先墊款甚多，儘管兩度出掌「肥缺」並參與斂財，結果仍是得不償失。「計此役籌墊軍費已達二百餘萬元，財市兩廳均各有案。自是以後，家業蕩然」，<sup>93</sup> 可見令楊西巖短時間籌集數萬元給蔣中正，勢所不能。即便偶爾獲得收入，亦很可能優先將錢用於歸還其本人或其它四邑商人之墊款。鄧演達登門拜訪過了約一個月後，蔣仍不忘電詢廖仲愷「兄言軍校月款已妥，是否政府另有指定」，可見軍校確實存在財政問題，非純粹藉口。目前並不清楚楊西巖是否有意刁難而不發經費，但這已成為蔣氏聲討楊氏與孫科之理由。

<sup>88</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58。方括號內容為編者所添。另外，原文斷句有誤，作者作了調整修正。

<sup>89</sup> 陳志剛，〈新視角下蔣介石與聯俄政策的考察〉，收入張憲文主編，《民國研究》，第2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36-37。

<sup>90</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4輯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193、1204。

<sup>91</sup> 〈禁煙督辦行將更動之內幕〉，《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3月18日，張1頁3。

<sup>92</sup>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4輯第2冊，頁1213-1214、1219。

<sup>93</sup> 杜元載主編，《革命人物志》，第9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2年），頁309。

蔣中正要求「革除市儈壟斷財權」，針對的絕非楊西巖等一、二人。正如他在3月25日致胡漢民書的信中表示，「弟之行止不應以一楊西巖免去而定」。<sup>94</sup>他反對的是以楊氏為代表的四邑港商「資本派」（即所謂「財團」），並進而反對把資本派引入廣東政界並為之做後盾的孫科，故其打擊範圍已涉及到更廣泛的太子派，此態度在他3月14日致廖仲愷的長函中得到充分表露。蔣在函中首先譴責，自去年國民黨重占廣州作革命基地以來，政府高層「對於民政、財政、軍政、未聞有一實在方案內定」。認為廖仲愷、鄒魯接替資本派上臺後，於民政上「無方針無條理」，在財政上「不公開不整理」，以致局面日壞。蔣對廣東「軍事紊亂不可收拾」的情況稍有自責（畢竟擔任過大本營參謀長一席），卻用頗大篇幅痛批孫科邀請楊西巖等「財團」、「市儈奸商」辦理財政，導致貽誤大局：

今日粵中財政，已為財團所把持，財團不去，則財政無人可辦，而財團貪劣惡毒，人人共見，如欲其辦理財政，未有不假公濟私，以敗壞政府名譽，喪失本黨信用者也。試問在粵各軍總司令軍長中，有一人贊成財團者乎？且有一人不恨財團之貪劣惡毒，攪亂粵中財政者乎？如用此等奸商辦理財政，誰不自危，如用此等市儈包辦鴉片捐稅，誰能信其不厚圖中飽，何軍肯放棄既得權利，以讓給財團之霸佔而絕生命乎？<sup>95</sup>

蔣氏在該函對孫科也有嚴厲警告：「如果哲生此後仍欲庇護財團，執迷不察，而孫先生必以哲生信用財團為是，此非財團誤大局，實乃哲生害大局，亦可曰哲生之終身，乃為孫先生所害也。」之後蔣提出解決當下廣東困境的辦法，並指責各老黨員不應任由中山寵信資本派，使此等「宵小」侮辱同志。<sup>96</sup>既然太子派在蔣的筆下如此不堪，他自然需要推薦更好的替代人選。實際上他早已對孫中山有所陳述。

3月2日蔣中正致孫中山一封長信，裏面寫下他為協助元老派重掌廣東大局而提出的核心訴求。蔣氏抱怨道，自1923年以來孫中山信任「新勢力」，「置舊日系統於不顧」。然而這些新勢力或別有所圖，或趨炎附勢，在大局危急之際「紛

<sup>94</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71。

<sup>95</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71。

<sup>96</sup> 〈蔣介石致廖仲愷函一件〉，《民國檔案》，1993年第1期（1993年4月），頁11-13。

然各謀生路」。他強調自己「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後，即提出將「諳熟本黨之歷史」的胡漢民（即信中所指的「舊日系統」）召回做廣東省長，讓胡幫助許崇智執掌廣東軍事。<sup>97</sup> 一些學者認為蔣中正此信中提到的「新系統」指共產黨員，筆者卻認為此種解讀之證據尚嫌不足，「新系統」實指1923年1月以來進入廣東軍政兩界的各種新的軍政勢力。<sup>98</sup> 裡面既有以楊希閔為代表的客軍勢力，也有孫科引薦而來的「資本派」與「舊交通系」。蔣用大篇幅批評這些新勢力，如「先生之門，身為軍府僚屬，而志在西南統帥者有之，暫且蟄伏一時，而謀豎獨力旗幟者有之」，前者雖未指名道姓，但顯然指軍事人物，可能是客軍陣營內之人。<sup>99</sup> 又如「觀於陳逆變亂，石龍失敗之際，紛然各謀生路，終始景從之人數，寥如晨星」，此句顯為批評1923年11月中旬陳軍逼近廣州前，革命陣營中那些自行逃跑的大小人物。相較之下，蔣氏幾乎指名道姓地譴責那個曾經被他推薦擔任廣東省長的楊庶堪：

至如當世之策士，不先謀粵局強固，根本穩定，而惟弄其私智，施其小技，聯滇不成，乃思聯湘，借重一方排斥他方，姑不問其用心究為何如，亦不必深信蜀中同志之誹議。然而強枝弱幹，捨本逐末，團結外力，壓迫內部之害，其必由此而起。不寧惟是，吾又知粵局之破裂，各部之糾紛，亦將隱伏於其中。<sup>100</sup>

<sup>97</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45-147。

<sup>98</sup> 認為蔣氏有反俄反共之意，起於他3月14日致廖仲愷函內最後一大段，闡發其認為「俄黨殊無誠意可言」之感想。多年後蔣氏在其《蘇俄在中國》中提到該函，並述「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分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茫心理」，故辭去校長職務。見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卷（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頁287-288。然而從蔣中正與粵軍張國楨、張民達等將領之衝突，及他最後親自驅逐許崇智離粵，還有討伐滇桂軍的經歷推斷，當時蔣最痛恨的是占據廣東要職或地盤而謀私利的人。此外蔣亦十分痛恨反孫中山之人，如陳炯明即是。但1923-1924年間共產黨人在粵尚未有明顯地從事上述行為。此解釋來自匿名審稿人之提點，在此表示感謝。

<sup>99</sup> 據說1923年初李烈鈞企圖在粵組織滇湘贛粵桂聯軍，並自任總司令。1924年蔣中正常向孫中山批評李烈鈞，蔣回粵後李亦失寵。見〈粵京宮庭爭寵記（四）〉，《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5月8日，張1頁3。

<sup>100</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63-164。



蔣中正最初支持楊庶堪任省長，目的是為胡、廖重返廣東鋪路。既然蔣可因此理由擁楊，自然可以此理由倒楊。楊庶堪被發表為省長後，開始亦遭各方勢力反對，其中滇軍尤甚，<sup>101</sup> 故初時未就職。但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支持楊庶堪，在孫中山默許下於1924年2月中旬調湘軍入穗，藉口統一財政逼滇軍交出其占據的收入來源，此舉同時亦有武裝擁楊就職的味道。據說湘軍與楊庶堪均一度獲太子派支持。<sup>102</sup> 因此滇軍稍作讓步，撤去占據省長公署的部隊，楊庶堪隨即派人入署為就職作布置準備。<sup>103</sup> 楊庶堪結納太子派與外省軍隊，既得罪胡漢民為代表的元老派，又得罪厭惡客軍的許崇智，顯然違背蔣中正推薦他做省長之初衷。因此蔣氏致孫中山函中有所謂「團結外力」，「強枝弱幹」，「捨本逐末」之指責。所謂「枝」、「末」，即滇軍湘軍等客軍。所謂「幹」、「本」，即許崇智粵軍。1924年的蔣中正日記未得保存，蔣年譜記載此年2月的資訊亦不多，不知蔣是否在其辭職前就此問題對孫中山有所陳述。筆者推測，蔣或在2月20日前後曾向孫提出勿繼續用楊庶堪長粵，<sup>104</sup> 因此舉與蔣氏此前主張者相反，必令孫感到不快而難被採納，故蔣致孫的這封長函中有自責「失信於黨，見疑於上」的話。

其實孫中山已多次叮囑胡許二人留粵工作，為何蔣中正仍喋喋不休地請孫促二人返粵呢？事情的關鍵在於孫能否真正信賴二人，在廣東政軍兩界中為他們留下盡力發揮的空間。胡漢民是年1月因參加「一大」已回過廣州，當時因廖仲愷堅持不做省長，胡氏接任該職的呼聲頗高。許崇智方面，孫中山和眾多粵籍將領一直去電呼籲他回粵就職。胡許二人沒有留粵的根本原因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尚不適合。據說孫曾問胡是否願意繼任省長，胡答以須待孫科辭市長職務，中山惟以

<sup>101</sup> 廣東省檔案館編，《民國廣州要聞錄》，第17冊，頁216。

<sup>102</sup>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4輯第2冊，頁746；關於1924年初滇湘軍矛盾與廣州政局，參見馮閃，〈范石生與廣東籌餉總局〉（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5-10。

<sup>103</sup> 〈楊庶堪就職前之設置〉，《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2月19日，張3頁13。

<sup>104</sup> 有報紙認為蔣憤於滇軍阻撓楊庶堪就任省長而辭職，見《最近廣州政潮之現象》，《總匯新報》，新加坡，1924年3月5日，版2。又有報導指2月間胡漢民、汪精衛離粵赴滬皆因反對楊庶堪就任。見〈謝英伯有離開廣州說〉，《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2月27日，張1頁3。上述新聞均反映楊庶堪任省長一事，是當時廣東政治中極具爭議之問題。

沉默回應。<sup>105</sup> 此外，孫科常對乃父指責元老派，控告其縱容私人盤踞各機構，開罪於華僑等，中山因此對胡等頗有不信任之表示。<sup>106</sup> 這段時間裡，孫中山也更重視湘軍及豫軍。如前文所述，孫曾試圖用湘軍逼迫滇軍就範。另外孫也曾策劃調豫軍往西江一帶與李濟部粵軍對峙，令粵籍將領進一步感受到地盤遭外省人侵蝕的危機。<sup>107</sup> 從廖仲愷、胡漢民致蔣函電中，有所謂「根本改革」、「根本觀念之要求」、「根本問題」的說法，<sup>108</sup> 其背後所指的即要求孫中山放棄對太子派與客軍之偏愛，完全信任胡許二人，為二人提供適合發展的環境。在得不到中山的某種許諾前，儘管各方勸告之函電不斷，蔣中正必與胡許二人共同進退，蟄居老家絕不復職。

3月17日，大元帥府令免楊西巖職並聽候查辦。據說與胡漢民關係密切的古應芬促成了查辦令之出爐，<sup>109</sup> 廖仲愷馬上把此消息通知蔣中正。<sup>110</sup> 24、26日胡漢民兩次函蔣，認為粵方已有「根本改革之決心」，望蔣速復職。廖仲愷於4月3日又致電蔣云：「先生〔按：指孫中山〕近多感觸，親信者不宜離去也。」<sup>111</sup> 顯示中山在感情上更傾向元老派。又據許崇智幕僚李基鴻回憶，孫為表示重新倚重粵軍，促許崇智回粵工作，答應許氏所開條件：讓蔣中正擔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此項讓許氏自行說服蔣）；所有粵軍駐地之財政交粵軍總部統一整理，六個月後整理完竣歸還中央；請任胡漢民任廣東省長；廣東兵工廠交粵軍總司令部管轄（此項僅答應從滇軍處收回歸陸軍部）。<sup>112</sup> 許崇智顯然比較滿意此約定，便於3月末親自去奉化找蔣。到4月21日蔣終於動身回廣州。<sup>113</sup> 在他回粵前後一個月間，政局再次大變。除楊西巖早已去職外，伍學煥的全省民船自治聯防督辦也被

<sup>105</sup> 〈逐鹿中之省長〉，《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1月18日，張1頁3。

<sup>106</sup> 〈省長問題之過去及現在〉，《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1月8日，張1頁3。

<sup>107</sup> 因大本營所轄桂軍陳天太部奉命開拔往廣西途中，遭李部粵軍第一師殲滅。

<sup>108</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69、170、173。

<sup>109</sup> 〈查辦楊西巖之內幕〉，《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3月31日，張1頁3。

<sup>110</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69。

<sup>111</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73-175。

<sup>112</sup>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23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頁156-157。

<sup>113</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頁175-177。

撤銷，鄧澤如被任為兩廣鹽運使，之後是許崇智就粵軍總司令職位，胡漢民任大本營秘書長兼代理大元帥職務（因孫中山生病）。蔣中正抵粵不久後通電痛罵楊庶堪離間在粵主客軍感情，迫其辭職離粵，最後廖仲愷再任省長。<sup>114</sup> 太子派在省府中僅掌控財政廳長一席，但該機關已布滿胡毅生之私人。<sup>115</sup> 至許崇智方面，因其確實掌控粵籍聯軍在西江流域防地的財政收入，其嫡系部隊終於得以補充、恢復。

## 伍、結論

周恩來在1943年回顧黃埔軍校創辦之初的歷史時，指蔣中正當時反蘇反共，不是真心誠意與共產黨合作，聲稱「有一次蘇聯顧問為革命說了幾句話，他就不高興，拂袖跑到上海去了。」<sup>116</sup> 蔣中正晚年在其著作《蘇俄在中國》又把自己辭職一事，說成是自己先知先覺、反共護黨的行為，甚至寫中山「准許我不聞問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sup>117</sup> 因為有這些後見之明，才令不少後來者把蔣本次辭職事件與反共問題掛鉤，沒留意到這是蔣中正積極聞問廣東政治導致的事件。

當1924年國民黨改組時，蔣中正在黨內輩分尚低，連參加代表大會的資格也沒有。他在孫中山幕中被視為有能力的軍事人才，而非政治人才。廖仲愷曾對馬

<sup>114</sup> 〈黨爭與政爭之最近活劇〉，《總匯新報》，新加坡，1924年4月22日，版2；桑兵主編，敖光旭編，《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第8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147；廣東省檔案館編，《民國廣州要聞錄》，第17冊，頁270；〈特任廖仲愷廣東省長〉，《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6月15日，版2。

<sup>115</sup> 財政廳長初為財政部長鄭洪年兼，後由市財政局長陳琪璦兼。陳氏就職時還特地函聘胡毅生做顧問，見〈陳琪璦聘財廳高等顧問〉，《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6月28日，版7。

<sup>116</sup> 〈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15。其實從蔣氏辭職到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周恩來一直在歐洲，後者作為新加入國民黨的「局外人」，恐怕難以獲得這場高層黨爭的準確資訊。

<sup>117</sup> 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卷（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頁288。



林稱讚蔣是一個優秀的軍人，「從不爭地位，也從未參與權柄之爭」。<sup>118</sup> 不過在以武力爭奪政權之時代，軍事與政治始終密切相關，欲令蔣不問政治實不可能，其主動過問廣東省長人選，捲入太子、元老之爭，即是其積極參與政治之表現。

1923年12月蔣中正自蘇聯返抵中國時，其心情當是失望的。因他銜中山之命，向蘇聯人「兜售」的西北軍事計劃並未得到後者之積極回應，可謂有辱使命。<sup>119</sup> 有趣的是，蔣返回奉化後竟連續四天不斷誦讀前後兩篇〈出師表〉，自稱「手不釋卷」，更稱「餘自以為文筆多有與此篇相若者」。因為這兩篇古文，蔣氏似掃淨內心的陰霾，且鼓起勇氣繼續向孫中山透露自己的政見。在「誦讀數十遍」後，他似乎把自己定位成孫中山身邊之諸葛亮。當1924年間蔣氏在粵日益嶄露頭角時，反孫輿論亦諷之為「號稱諸葛孔明之蔣介石」，「為孫文之腦」，<sup>120</sup> 可見蔣中正的自我期許已獲得外界的一定認可。

在中華文化之描述中，諸葛亮於軍事上既足智多謀，在政治上也是治國之才，對君主還是鞠躬盡瘁的忠臣。蔣欲成為諸葛亮，自然不能僅做孫中山之軍事參謀，他還要發揮政治才華，以鞠躬盡瘁地工作向自己的明君表達忠心。向孫中山講述他對廣東省長人選的意見，或是蔣實現自我期許的重要一步。

1923-1924年間，蔣中正對自己的政治謀略已頗有自信，惟其個人成長經歷導致其成年後有種幽暗多疑的心理與性格，使其不時產生未受信任之不安。無論在1924年的不辭而別，還是過去多次辭職，都與他感到未受上司之絕對信任有關。<sup>121</sup> 當他滿懷對孫中山的忠誠呈上之計謀與忠言未獲採納時，其失落與痛苦可想而知。因此在致廖仲愷之長函中，他自稱「去年之上年，弟在粵時，實定有一全盤計劃」，惜未能執行。又稱「今日粵局之財政、軍政，決非束手無策之時也。乃患在不求方策，尤在以方策為無用」，即抱怨自己已有方策，惟不被採用。在蔣致孫中山的長函內，他抱怨孫不能對其「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

<sup>118</sup> 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298。

<sup>119</sup> 據說蔣不聲不響地抵達上海，甚至有意避見當地同志，可見其內心之屈辱。

<sup>120</sup> 〈粵京宮庭爭寵記（四）〉，《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5月8日，張1頁3。

<sup>121</sup> 王奇生，〈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2010年10月），頁90-91。

布展菲材」，表示「今敢還望先生以英士〔按：指陳其美〕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蔣氏此函還強調：「中正不回粵，不能置身黨外，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或蒙先生曲諒，不令兼任他務，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勢恐不能耳！」這兩封信都表明了蔣中正堅決要過問廣東政治問題，並呼籲黨內領袖們給予信任的決心。

蔣中正以辭職為籌碼向孫中山提出略帶越軌之請求可謂一次豪賭，<sup>122</sup>但這次豪賭之結果對蔣而言是極好的。當許崇智獲得回粵重振旗鼓的機會和資源時，作為其參謀長的蔣中正自然也能共用其中好處。粵軍從西江一帶獲得穩定收益時，黃埔軍校亦得從粵軍總部軍需處獲得可觀的金援，<sup>123</sup>元老派對東江陳炯明勢力持堅決剿滅的態度，<sup>124</sup>亦為蔣中正提供施展拳腳的發展機會。胡漢民、廖仲愷二人對聯俄容共均持積極態度，他們在粵掌權對團結革命力量發揮重要作用。許崇智部隊加上黃埔軍校經大約半年發展，次年春即大舉東征。在蘇俄顧問的深度參與下，粵軍第二師、第七旅及黃埔軍校教導團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東江敵軍，為鞏固、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打下堅實基礎。若非元老派重掌權柄，這一切大概不會發生，而蔣的個人發展或難有突破。

<sup>122</sup> 蔣中正並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唯一人選，孫中山自可另行任命他人擔任。

<sup>123</sup> 如該校1924年10月獲借支5千元，11月借支1萬元。蔣身兼長洲要塞司令，每月另有二、三千元伙食費。見〈粵軍總司令部民國十三年十月份支出各部隊薪餉伙食暨各機關經費報告表〉，《建國粵軍月刊》，第1期（1925年1月1日），頁14；〈粵軍總司令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份支出各部隊薪餉伙食暨各機關經常費報告表〉，《建國粵軍月刊》，第2期（1925年2月1日），頁14。

<sup>124</sup> 太子派則主張對陳議和，見〈粵省局勢與和戰兩種聲浪〉，《益世報》，天津，1924年6月18日，版6。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彙編

-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9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3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4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
- 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 李穗梅主編，《古應芬家藏未刊函電文稿輯釋》。廣州：廣州出版社，2010年。
- 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等編，《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第1卷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
- 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
- 秦孝義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
- 廣州市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
- 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4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廣東省檔案館編，《民國廣州要聞錄：近代廣東海關檔案（粵海關情報卷）》。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 二、文集、日記、回憶錄、訪談錄

王業晉主編，黃健敏、李寧整理，《李仙根日記·詩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年。

李基鴻，《百年一夢記》，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423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杜元載主編，《革命人物志》，第9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2年。

沈雲龍訪問，謝文孫記錄，《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3年。

尚明軒，餘炎光編，《雙清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金應熙，《金應熙史學論文集（近現代史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馬超俊，《馬超俊口述自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

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3年。

楊滄白，《天隱閣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

鄒魯，《回顧錄》。長沙：嶽麓書社，2000年。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7冊。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未刊本》（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 三、專書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

黃震威，《傅秉常傳：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  
司，2018年。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卷。臺  
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

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南京：正中書局，1948年。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 四、雜誌、報紙

- 《大公報》，天津，1924年。
- 《申報》，上海，1923、1924年。
- 《民國檔案》，南京，1993年。
- 《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
- 《叻報》，新加坡，1923、1924年。
- 《建國粵軍月刊》，廣州，1925年
- 《華字日報》，香港，1923、1924年。
- 《時事新報》，上海，1923、1924年。
-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廣州，1923年。
- 《益世報》，天津，1924年。
- 《晨報》，上海，1923年。
- 《順天時報》，北京，1924年。
-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
- 《總匯新報》，新加坡，1924年。

####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王奇生，〈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  
《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2010年10月）。
- 王東方，〈試論蔣介石與孫中山〉，《史學集刊》，1986年第3期（1986年10月）。
- 李吉奎，〈中國國民黨一大前後孫蔣關係研究〉，收入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  
管理委員會編，《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第1輯。上海：上海宋慶齡  
研究會，2009年。
- 沈成飛，〈廣州官產投變事件中的革命政府與地方社會〉，《歷史研究》，2014  
年第2期（2014年8月）。
- 余敏玲，〈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4期（2000年12月）。

周興樑，〈略論孫中山與蔣介石的關係〉，收入周興樑主編，《孫中山的偉大思想與革命實踐》。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陳志剛，〈新視角下蔣介石與聯俄政策的考察〉，收入張憲文主編，《民國研究》，第2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陳國強，〈蔣介石辭黃埔軍校職原因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1993年12月）。

曾成貴，〈蔣介石辭辦黃埔軍校問題考述〉，《理論月刊》，1994年第11期（1994年11月）。

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

楊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2002年12月）。

## 六、學位論文

馮閃，〈范石生與廣東籌餉總局〉。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6年。